

庆 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四十周年



彭斐章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联合编辑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彭斐章选集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合编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一九八八年

彭斐章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主编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出版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发行组发行
(成都市总府街六号)
成都市自力印刷厂印刷 1988年

字数 100千字 印数1—1000册
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88048

3.00元

简 历



彭斐章字庆成，1930年9月30日出生于湖南省汨罗县（原湘阴县），湖南长沙东乡高仓中学毕业，曾担任湖南省湘阴县清溪乡中心国民小学、第十完全小学、第十四完全小学教师、校长等职。1953年8月毕业于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1953年9月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任助教兼秘书，1956年11月至1961年3月在莫斯科国立图书馆学院（现名文化学院）研究生部毕业，获教育学副情士学位。现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南京大学兼职教授，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委，湖北省科委自然科学研究系列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文化厅图书资料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和丛刊顾问，湖北省图书馆学会第1、2届副理事长，中国图书馆学会第1、2、3届理事，现任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顾问。

1980年受教育部委派担任“中国大学图书馆代表团”团长，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考察高等学校图书馆事业，1987年参加文化部组织的“中国图书馆代表团”赴苏联和保加利亚进行业务考察，1988年赴美国波士顿、伊利诺斯、华盛顿、纽约等地访问讲学。1986年9月出席在北京由国际图联合中国图书馆学会联合召开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我国图书馆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问题”的发言。

序

这本文集是彭斐章先生在图书馆学园地近四十年辛勤耕耘的业绩，同时又应看成是作者从事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我国目录学研究历史悠久，在清代乾嘉学术风气的熏陶下，逐步形成比较系统的知识，但是，如果作为现代科学意义来看，目录学仍然只能认为是缺乏理论体系，内容尚未完备的一门辅助学科，只有到了二十世纪初叶，目录学才逐步汇集、融合、改造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说，遗产是丰富的，内容是充实的，中国建立以后，目录学如何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建立完善的科学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应有作用，历史的任务落到新一代学人身上，斐章先生正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目录学家，文集选录的这些文章，大致可以说明。

本世纪六十年代，作者在苏联国立莫斯科文化学院专攻目录学、介绍、宣传列宁目录学遗产，介绍苏联书目工作成就成为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作者这些早期的文章，我觉得可宝贵的就是从目录学的党性原则上影响了我国目录学研究，同时也为我们图书馆书目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借鉴。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作者在目录学基本理论问题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影响了我国目录学有关方面的研究，其主要方面有：一、深化目录学理论研究，促进目录学体系的完善，如目录学对象看法中的矛盾说，即认为“揭示与报导图书资料与人们对图书资料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领域里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也就是目录学研究的对象”。这种看法已逐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又为论述目录学的社会功能上，结合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文献数量的增长和内容的深化与综合，读者

阅读需求的变化，做到更系统地说明目录学在读书治学上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二、评述和总结我国目录学研究现状，促进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开展，作者在我国新时期的历史阶段中，注意结合目录学研究的已有成果，总结过去，指陈利弊，这是作者一系列文章的集中点，特别是在各种不同意见争论中直接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一段时间里的目录学“危机”说，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合适的。又如一段时间里盛行新构想和新思考，作者认为应坚持创新与严肃的态度，只有如此，才能促进目录学的繁荣，又如肯定六十年代目录学对象的讨论等。作者作为新中国目录学教学与研究的参与者，但却在历史总结的角度去评论事件与过程，应该说，更能集中地指出问题，说明教训。三、介绍苏联目录学研究，帮助人们利用人类积累的成果。俄国目录学有着比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十月革命后，在列宁的文化思想指引下，提高了目录学理论和基本问题的研究水平，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图书馆书目工作上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故此，学习和借鉴苏联目录学的成就，应该说是重要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国家的目录学理论、方法和苏联目录学理论、方法同样是我们的借鉴，作者这种坚持不懈的介绍与评述苏联目录学的工作，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作者从1978年始招目录学硕士研究生，十多年来，结合教学与研究，注意目录学研究趋向，作出专题性研究，概括历史进程中目录学研究的重大事件，而且结合发展状况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学术研究上贵在创新，但紧密结合现实发展，作出理论的说明，同样也是一件新的工作。我们要做到对老一辈目录学家的研究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也应对现实中涌现的新成果予以充分注意与肯定，自然，对存在我们队伍中的问题，更应毫无保留地指出来，学术研究的健康风气，是靠广大学术工作者共同造成和促进的，作者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妥当公允与否，自然是读者

的权利了。

我国图书馆学领域内包括图书馆学基本理论，文献整理技术与方法，图书馆历史与现状，图书馆情报服务的进展等方面研究，建国四十年来，成绩是相当显著的，与图书馆学紧密相关的目录学、文献学、情报学的研究，也已经枝繁叶茂，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我们许多方面，终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基本点上，战斗在图书馆学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几代人，改变了旧中国图书馆学落后、分散、不成系列的状况，这是谁都否认不了的。正因为如此，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四川省图书馆学会、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组织出版一批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学、情报学家的论著，是保存文献、嘉惠士林的好事，是应该积极支持的。

作为在目录学领域与作者合作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同志，作者索序于予，不揣粗陋，谨志数言如上。

谢灼华

1989年9月于武汉大学

目次

简历

序	谢灼华 (1)
迎接信息时代的科学——目录学的现状与未来	(1)
评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的目录学研究	(13)
新中国目录学研究述略	(23)
学习列宁目录学的宝贵遗产	
——为纪念伟大的列宁诞辰九十周年	(36)
学海浩渺话舟楫——试论目录学知识普及问题	(43)
国家书目述略	(51)
书目之书目论略	(58)
论苏联图书馆事业发展中观念的变革	(66)
苏联目录学研究之现状与前景	(75)
苏联目录学的理论与实践	
——《目录学普通教程》评介	(85)
苏联省图书馆书目工作的组织	(95)
苏联图书馆学目录学教育	(105)
主要著译目录	(114)

迎接信息时代的科学—— 目录学的现状与未来

目录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说它古老，是因为目录学在我国是一门应用广泛的传统学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如果从汉代刘向、刘歆主持编制的《别录》和《七略》奠定我国古典目录学发展的基础算起，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若从“目录学”这一术语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在北宋仁宗时，苏象先在其所著《苏魏公谭训》卷四中始有目录之学的提法来看，迄今也有一千年的历史。目录学产生以后，经宋代史学家郑樵和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等学者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我国古典目录学理论体系，目录学成为一门“显学”，正因为目录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与文献紧紧相联，与学术发展密不可分，因而，吸引着广大文史学家和其他学者从事目录学研究，他们将目录看成是读书治学的门径，进行科学研究的指南。二十世纪以后，目录学作为文史学科的基础知识而普及到文化学术界。正如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目录学家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指出：“目录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

说它年轻，是因为目录学是一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广泛实用价值的学科。处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目录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目录学优秀遗产的基础上，认真地吸取了国外目录学的经验和先进的方法技术，不断丰富目录学的内容。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量的急剧增长，信息交流的不断扩大，特别是现代技术在书

目工作中的应用，使得目录学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科内容范围的拓展，目录学研究不断深化，分支学科，交叉边缘学科不断涌现，现代目录学已由研究如何指导读书治学变成研究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文献信息来解决巨大的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的科学。现代目录学是以广泛应用于社会，紧密结合社会发展和生产建设，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己任，它在当代社会和科学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正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信息时代将使古老的传统目录学紧跟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科学发展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变革与创新。现代目录学正处于变革的时期，不少目录学工作者纷纷撰文，对我国目录学研究的的成绩和存在问题作了很好的评述，并对怎样加强目录学研究，促进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提出了意见，这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怎样正确地估量目录学的学科地位与形势，怎样进一步拓宽与加深目录学的研究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从事目录学研究和整个目录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今年，新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已整整经历了四十个春秋，四十年来目录学的发展经过了曲折的道路，有成绩、有经验也有教训。本文旨在从整体发展上对某些主要问题进行简要的评述，以便明确现代目录学的研究方向。

一、关于目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广大目录学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于目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目录学的学科性质，目录学的内容，目录学的理论体系以及目录学的方法论等问题开展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近年来，目录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1、近年来注意从我国目录学整体发展高度来探讨目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重视将目录学基本理论问题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当前目录工作联系起来探讨，把书目方法提到方法论的高度作为目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来研究。这些特点从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论著可以看出。如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合编的《目录学概论》(1982，中华书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式出版的第一部高等学校目录学教科书，它概括和总结了三十年来我国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对目录学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将目录学理论与目录工作实践结合起来，把书目方法提高到方法论的高度加以论述，注意古今中外目录学知识的结合，为许多高等学校图书馆学系科采用作为教材，获1988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983年8月在沈阳召开了全国目录学专题学术讨论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中国图书馆学会下设的目录学教研组建立以来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大会收到的学术论文220篇，入选参加会议讨论的论文64篇，围绕着目录学界关心的话题即书目工作如何为四化建设服务和国内外目录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等问题展开讨论，涉及目录学和书目工作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内容丰富多彩，疏通了目录学情报交流的渠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目录学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检阅，对目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彭斐章、谢灼华的《关于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报》1980)，知寒的《对建国以来目录学研究的评述》(《山东图书馆季刊》1984年)，彭斐章的《新中国目录学研究述略》(《武汉大学学报》1984年)，乔好勤的《我国近十年目录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图书馆学通讯》1988年)，余庆蓉的《十年目录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广东图书馆学刊》1988年)，彭斐章、陈传夫的《近年来我国目录学研究的综述》(《图书馆学文摘》1985年)等，这些论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阶段目

录学研究的成绩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对存在的问题作了认真的分析，并且展望了今后目录学发展的前景。这些论著对我们正确地估价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目录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是有重要作用的。应当指出，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公开发表的有关目录学学术论文约计 1290 篇，还出版了一批目录学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和专著，这些成果与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承认这一客观事实，才有可能恰如其分地估量目录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那种，颂古非今，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目录学研究的成绩一笔抹煞，认为“共和国近三十年的失误，目录学也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让政治取代了学术。”是违背历史，不顾现实的。

2、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有了新的进展。我国目录学界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开展了以“目录学研究对象”为中心的关于目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有长期从事目录学教学和研究的目录学专家和学者，有从事目录工作实践的目录工作者，还有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气氛非常活跃，只因大动乱开始，讨论被中断十年，到八十年代初，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继续恢复起来，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讨论，而是在认真总结和评述五十年代末进行的讨论中提出的各派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尽管各派人物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关于目录学的定义和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看法，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入，认识的不断提高，各派论点渐趋接近，多数同志认为应从事物的规律，矛盾，本质等方面研究目录学的对象问题。目录学应当研究规律。

3、关于目录学的内容问题

目录学的内容是由目录学研究对象所决定的，目录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它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是处在整个学科

体系之中，与周围的学科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互相渗透的，一门学科能否跟上时代并顺利发展，是否具有活力，一方面要看它能不能渗透到其它学科领域，同时，也取决于它能不能吸收其它学科的最新成果和先进方法来丰富自己。目录学是在与整个学科体系的紧密联系中前进的，目录学自古以来就吸引着广大的文史学者和其他学科的专家来从事目录学研究。他们都懂得利用目录学知识来装备自己，作为自己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来看待。目录学知识已经渗透到其它学科。与此同时，目录学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吸收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丰富目录学的内容。由于数学方法、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导入，使得目录学的研究方法由单纯的定性分析走向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控制论的原理与方法应用到目录学中，用以探讨目录工作的科学组织和有效利用而形成的书目控制论。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引进目录学以后产生了书目计量学，其目的在于运用定量方法描述各门学科的书面信息特征、形成及其发展趋势，以解决文献积累与利用之间的矛盾。由于引进比较方法为目录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出现了应用比较方法，通过对不同国度的书目情报活动和目录学理论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其异同，探讨目录学发展规律的比较目录学。目录学与一些相近学科如图书馆学、情报科学、档案学、图书发行管理学等关系非常密切，它们在内容上出现许多交叉，在方法上相互借鉴，这些说明学科发展到今天、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书目情报工作的需要，读者文献信息需求的多样性和专指性，开展专科学目录学研究成为必要。目录学与一些学科相结合形成了专科文献目录学，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目录学、文学文献目录学、历史文献目录学、科技文献目录学等。正是这些学科与目录学相辅相成，构成了当代目录学研究的庞大阵营，充分体现了目录学在当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文

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录学理论是丰富多彩的目录工作实践的概括与总结，目录学工作者在分析整个目录工作实践活动时，第一，不能自我局限于图书馆的目录工作范围之内，实际上从事书目情报工作的有情报机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档案机构，新闻机构以及各种学术团体和专家学者个人，应当把这些从事书目情报工作的机构和个人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第二，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技术和其它现代化技术在书目情报工作中的广泛应用，整个书目情报工作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书目情报工作是目录学理论变革的先导，目录学研究应当面向现代化。目录学发展到今天，它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内容逐步深化，目录学理论更加丰富，这是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化，目录学知识已被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广泛吸收和运用，目录学也在吸收和利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新的方法，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决不容许将目录学的研究内容人为地狭窄化。

二、关于目录学史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关于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录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按照“古为今用”的方针，采用批判地继承和发展的观点，对目录学史进行了研究，出版了王重民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吕绍虞的《中国目录学史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来新夏的《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1981年版），罗孟桢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等目录学史研究的专著，还发表了一大批有关目录学史方面的研究论文，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88年底总共发表了目录学史方面的研究论

文 580 篇，占整个四十年所有目录学论文总数 1290 篇的 44.9%。这些论著主要是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显示出如下特点：①试图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出发将目录学史的发展和当时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联系起来，对某一个历史时期目录学发展的特点及其规律进行研究，例如，来新夏《清代目录学成就浅述》（《历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一文，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清代目录学研究成果，认为清代是我国古典目录学兴盛、发达的阶段，这一时期目录学著作成果丰盛，目录学学术领域广阔开拓，目录学的时代作用突出，致力于目录学研究的人才辈出，从这些方面看出清代目录学的成就超越于前代，成为一门显学，同时，它又是我国封建社会目录学成果的鼎盛时期，为资产阶级目录学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显示出清代目录学总结前代，开启后来的特色。类似的文章如王晋卿《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的主要成就》（《湘潭大学学报》1982 年第 3 期），谢德雄《宋代目录学的发展及其成就》（《图书馆工作》1982 年第 2 期），谢国桢《明清时代的目录学》（《历史教学》1980 年第 3 期）。②近现代目录学研究有所加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 1979 年，目录学史研究方面的论文约 25 篇，③，对近现代目录学家及其目录学思想研究的论文屈指可数，针对这种情况，彭斐章、谢灼华在《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80 年）一文中强调指出：“近现代目录学史的发展是一部新与旧的交替，进步与落后斗争的历史，也是封建主义目录学衰亡，资产阶级目录学建立与形成时期，同时也是西方目录学传入，影响我国目录学发展的时期，所以，无论从历史发展的阶段上，还是从目录学的内容上，都应当作为我们研究的着重点。”这些论点得到目录学界的赞同，近年来，对近现代目录学的研究有了很大加强，如乔好勤《略论我国 1919—1949 年的目录学》（《云南图书馆》1982 年第 1 期）一文，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三十年我国目录

学的主要成就及目录学派别的形成，试图探讨这一时期目录学发展的特点。还有一大批我国近现代目录学家及其目录学思想的论文，如卢贤中《论姚名达的目录学理论》（《江西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鲁海《阿英在目录学上的贡献》（《四川图书馆学报》1982年第1期）、韩继章《余嘉锡目录学思想初探》（《湘图通讯》1982年第4期）张厚生《郑振铎在目录学上的成就与贡献》（《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等。^③对目录学家和古典书目的研究范围比以往扩大了，改变了过去只集中对古代著名目录学家和几部著名的目录巨著的研究状况，近年来对一些以往很少被人们重视的目录学家和目录著作开展了研究，扩大了目录学史的研究范围。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目录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在学术界纷纷议论史学危机的时刻，对目录学界关于目录学史研究的意义与目的议论得比较多，公开发表的论文也有若干篇，认为对于目录学史的研究和花费的精力多了一些，对待当代目录学和古代目录学的关系上，首要的是要丢掉目录学“历史悠久”、“优良传统”的包袱，对目录学史的继承不应沉溺于史的研究，继承已经在自然地发展中流传下来了等。我们认为这些看法值得商榷，我国目录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书目文献极其丰富，目录学家代不乏人，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形成自己的独特传统而著称于世，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因此，弘扬祖国的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批判地总结和继承我国古典目录学历史遗产，作为发展当前的目录事业的历史借鉴，无疑是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这份宝贵遗产的研究，近年来有了很大成绩，是不是在这方面的研究和花费精力多了呢？我国目录学的研究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与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与目录工作实践的需要，还很不适应，必须大力加强目录学理论和实践

的研究，这是毫无疑义的。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历史不容割断，现代目录学是古典目录学的继承和发展，这就要求目录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发掘，分析和批判地总结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宝贵遗产，决不是自然而然地就继承下来的。当然，总结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必须立足于现实，为发展现代目录学和目录工作服务，这里有必要强调，对现实不应作狭窄的理解，要避免研究工作中的立竿见影的短视行为。这是我们在目录学史研究课题的选择上，研究过程中，以及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的安排上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历史已将目录学推进到信息社会；研究我国古典目录学的理论与实践能否为今天的现实服务呢？我想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关于发挥目录的教育功能的问题，我国学者有很精辟的论述，也有辉煌的实践。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七中说道：“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江藩在《师郑堂集》中指出：“目录者，本以定其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则易学而成功且速矣。”梁启超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中说道：“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这些论述强调了目录是指导读书治学的工具。张之洞编的《书目答问》是初学者略知治学门径的一部导读书目。梁启超编的《西学书目表》及《读西书法》是读者摸门径的推荐书目。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总结发挥目录教育功能的经验，对于开拓现代目录学研究领域，指导目录工作的进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特别是当前正处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时刻，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导致一些有错误观点和不健康的书刊纷纷出笼，造成阅读陈地的混乱状态，加强推荐书目工作，充分发挥目录在推荐优秀图书，指导读者阅读的教育职能，更加显得重要。

总之，古典目录学的光辉成就和优良传统不容否定，关键是